

中国经济升级的出发点在哪里？

中国社科院教授 财经作家 高峰

自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自力更生”的封闭式经济重新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并凭借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亲商政府的大力推动，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迅速抓住世界特别是东亚产业转移的机会。短短20余年，无论是在美国、欧洲、拉美、非洲、中东，还是中亚，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中国制造”就风靡全球。

然而，中国制造的繁荣一直建立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基础之上：产品主要集中于低端生产，掌握不了产业的制高点；对来自世界市场的原材料缺乏定价权；销售上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经济对外依存度畸高等。最近几年，大规模的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更是明显显现。随着土地和劳动力等各种成本的上升，利润微薄，以低端生产为主的中国制造正在失去原来价格取胜的比较优势，存在被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取代的危险；在高端产业方面，则面临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挤压。

中国制造业面临危机，必须转型，这已经成为各界的普遍共识。而如何转型，则是一条仍在探索的艰难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并寻找支撑本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不得不面对的危机

经济界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浙江温州一位雇用了1000多名工人的企业主，勉力经营，一年赚的利润不过100多万；而他的妻子在上海买了10套房子，8年后获利3000万。

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的金融套利行为严重，中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世界工厂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再由制成品外销支撑，而是由价格飞涨的房地产支撑。

中国制造业有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内部困境主要表现在，随着劳动力、土地、税收等各种成本的上升，以低端产品为主、利润空间有限的中国制造的收益越来越低。最近的数据是，2013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自2010年来连续第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速。专家称，随着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下降，未来农民工工资将持续快速增长。这对主要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影响重大。

二战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一条颇为清晰的产业转移路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到台湾，到东南亚国家，再到中国大陆。随成本上升发生的产业转移已成为一种全球化生产的典型模式。

可以发现，能够留住企业总部和研发、技术、营销、品牌等核心上游链条的日韩地区，在生产链很多转移出去后，经济仍能保持持续发展。而像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完全靠来料加工的地区，一旦生产成本上升，生产线被转移出去，便失去了在全球分工中的重要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山寨”和低质仍然是中国制造给人的重要印象。



对于一个经济发展承担了太多功能的社会来说，虽然上下都明知粗放式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但环境保护在中国一直是第二位的。最近一两年来，全国各地大面积雾霾频发，终于“倒逼”得对环境污染开始“动真格”。接下来一段时间，大批污染严重企业的关停和环保达标要求，势必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外部困境则主要来自于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和低端产品制造转移至东南亚、拉美等地对中国制造造成的两面挤压，以及在“两头在外”模式下缺乏原料定价权和欧美国家的市场保护主义产生的影响。

美国正在进入页岩气的新时代，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者，同时，一场以新型制造业、合成生物学、机器人、3D打印、智能城市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在发生。目前来看，这对于仍处低端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形成大的直接竞争，但明显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着中国往高端制造业升级的通路。

来自低端产业转移的影响目前对于中国制造更为明显。笔者最近注意到，在北京的社区商场中，热销的美国H&M和日本优衣库等大众服装品牌的产品产地很多已标为孟加拉或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些与中国地缘接近的国家作为新的成本洼地，正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制成品又大量回销中国。

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不再如以前一样致力于推动一个全球化的普遍市场，而是希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的区域性经济。正处于紧张谈判中的TPP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它被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在TPP的安排中，南美和东南亚是低端制成品的提供地。

在原材料和市场方面，“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的局面和大量的反倾销案使得中国制造业承受着更大的成本压力和不确定性。

这一切迫在眉睫的压力都要求中国制造业必须作出调整。

必须做出努力

正如危机一词所标示的，任何“危”情之下，同样面临着机遇。认识到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客观上面临转型，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逐步改变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结构，才能保证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制造业冷与兼有金融和消费性质的房地产业火爆之间的鲜明对比，是最近几年来横在中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一道巨槛。

因为制造业下行，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速不得不一方面“调结构”，即通过科技投入、产业政策等方法试图实现产业升级等创造新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要“稳增长”，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撑着中国经济发展。

过去几年，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提振实业、提升产业。新任总理李克强甫一上任，就在国际上四处推销“中国装备”，还曾被国际媒体冠以“高铁推销员”的称号。上任一年来，他一直将“调结构”和“稳增长”并提，并做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小微企业减税，进一步推动营改增等。但从去年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采取的阶段性刺激措施明显可以看出，“稳增长”仍然是政策前提。

经济与就业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主要的政治认同来源之一，不独中国如此。经济低迷和高失业往往与社会动荡直接相关，“调结构”更具有长远意义，但在现实中往往让位于“稳增长”压力。

在这种两难的矛盾下，同时受制于官僚体制本身的问题，政府应对制造业危机的很多措施从实际效果来看成效有限。比如，政府大力扶持的光伏产业形成了大规模过剩；中央强调要让金融回归实业，但在实业利润微薄，房地产和地方基建融资利润丰厚的情形下，不可能有不逐利的资本；从2005年开始，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口号的大量科研投入，造就了一个科研经费利益获得者群体，却并没有显著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一个较为成功的方面是产业内部转移。由于中国有差异性巨大的腹地，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除了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产业升级外，中国制造还有巨大的内部转移空间。

自2005年左右开始，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开始了向土地、劳动力和基础资源品等各方面成本更为低廉的中西部转移。虽然企业家们不时抱怨，中西部的投资环境不规范，政府招商“进得去，出不来”，但毕竟中国是一个同质性极强的中央集权国家，其交流成本比转移到完全不熟悉的国外要低得多。况且，中国制造业原来凭借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正是来自这些内陆中西部大省。

最近几年，在东南沿海制造业低迷的情形下，河南、四川等中西部人口大省制造业的兴起趋势明显，东部农民工总量增幅回落，中西部则增长明显，就是这种现象的重要反映。这种转移使得中国内部形成了一定的产业梯度，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平衡发展。

例如，浙江绍兴一带企业，将生产基地大规模外迁至土地、劳动力以及包括电力在内的其他基础品相对便宜的安徽一带，而在本地仍然保留着类似“总部基地”性质的强大技术、人才和营销网络。这种升级模式对两地是双赢的。

探讨出路

从拉美等地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结构过于单一的经济体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很难成为一个成熟经济体。中国是一个大国，除了为世界制造各种工业产品，并力图在国际制造业的价值链上走到附加值更高的上游外，需要经济形式的更多元化。

重塑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的形象，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重要一步。

一位专做中亚市场的浙江商人说，在当地消费者的眼中，欧美产品质量最好，土耳其处于中端，而中国产品一直是价廉质低形象。他对国内同行通过低报价拿到订单，为了节约成本偷工减料的经营方式非常痛心。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做质量有保证的中端产品，虽然可能因一时报价较高拿不到一些订单，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圈子内做得最好的一位，因为价格虽然高一些，但质量好，回头客多，而且利润空间更大，形成了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前任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表示，中国制造的一些有品牌的产品质量较有保证，但一些没有品牌的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可能较差，由于价格低廉而广泛行销，这对中国制造的整体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他建议，中国可以从政府层面制定一定的质量标准，这样有利于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质量和声誉在国际市场上的提升。

现实是，虽然中国制造面临各种问题，但中国稳定的国内形势、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产业链优势、营商环境、高中低兼有的发展梯度等要素加起来仍然具有很大优势。就制造业方面，中国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凭借几十年发展打下的良好基础继续在中端制造业市场努力，以质优而价格相对低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取胜。东南亚仍主打纺织品、服装等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当地用工成本也在急剧上升；美国虽然在大力提倡“制造业回流”，但由于成本的考虑，短期内也不可能与国内发生大规模的直接竞争。

经济结构多元化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民间和政府累积了大量资本，中国在全球的投资逐步加大，一些中国企业外迁至东南亚、非洲等地，这些也有利于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最近一些年，中国大的建设公司凭借在国内积累下来的经验，在中东和非洲等地非常活跃，中国的劳动力以另一种方式走向世界。

在国内市场上，劳动力收入上升同时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扩容，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将有着巨大的空间。在世界工厂之外，中国亦在成为一个重量级的全球市场，实际上形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双极格局。而从频频出现的“民工荒”看，中国制造业的外流并没有造成很大就业压力，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在发挥着缓冲作用。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只有生产性的服务业才有真正的发展空间。在现实中，金融、设计、营销和品牌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的大学生起薪已基本与一般普通工人等同，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与一般大学生匹配的中层就业空间有限。如何利用好大量的大学生资源，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会。

总之，只有一方面巩固“中国制造”的优势，另一方面发掘更多元平衡的经济支撑点，“中国品牌”、“中国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才能进入更平衡也更稳固的发展阶段。

名家视角·高连奎专栏 大政府的趋势与极限

其实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是有正面意义的，不仅可以让国家变得更自由，也可以让国家变得更富有。现在人们获得产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私人市场购买，一种是外包给政府，让政府统一采购，从私人市场购买虽然可以选择更多，但却更麻烦，而且更贵，还面临被坑蒙拐骗的风险，将各种事情外包给政府则可以更省心；政府具有批发优势，因此买到的产品也更便宜，而且更加的安全放心。其实，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自然就不愿意从市场上买东西了，人民就觉得麻烦了，将这些麻烦事交给政府来打理，是非常合算的事情，人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玩乐，当然这个目标短期内还不能实现。

但从长期看，人类社会越文明，人们从政府获取的公共产品就越多，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也将大政府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而那些政府只承担很少职能的社会称为野蛮社会，区分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标准之一，就是政府职能的多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政府提供的只有国防，到了封建社会，政府开始提供社会秩序，到了君主集权社会，政府开始提供基础设施，比如兴修水利，开凿运河，规划道路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又开始提供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

现代政府公共职能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现代公民越来越将麻烦带给公共社会，这就需要政府出马才能解决，比如城市公民所产生的各种垃圾就需要政府来统一处理，另一方面现代公民也对公共生活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比如私家汽车的增加也需要政府修建更多的公共道路。总之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越多，人类就越能从政府的公共职能中获得好处。

政府如果拒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后果则是可怕的，卡尔·波兰尼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以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起源而闻名。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该书出版于20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对鼓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主义展开了强有力的批判。波兰尼旗帜鲜明地反对鼓吹自发调节的市场，认为这种市场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鼓吹也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层次原因，是法西斯主义的来源。

他认为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的一部分，而经济也只是更为宽广的社会的一部分。鼓吹市场自发调节实际上是要求市场和社会“脱嵌”，这势必会导致市场和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和市场规则盲目扩张，市场规则要取代社会规则，市场要支配社会，人和自然被商品化，违背自然和人性。另一方面是社会自保运动急剧开展，社会通过种种运动，包括立法、建立殖民地、贸易壁垒，甚至战争来自我保护。而这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时，便是彻底抛弃市场和自由的法西斯主义登台之机。

波兰尼的结论是市场经济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相反它是毁灭自由的祸首。他主张市场得到限制，市场规则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规则必须得到尊重，人和自然应该得以保全，因此，国家干预不视为邪恶。与波兰尼批判自由放任，认为自由放任必然导致法西斯主义不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即使不存在法西斯，自由民主本身也会导致大政府的出现。

托克维尔认为个人财富和生活的安逸成为个人最大的追求之后，公共精神开始沦丧，他们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或者政府代表可以帮助他们打理个人生活以外的公共事务，贪婪的人们在交出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开始培育“一个闭塞心灵、削弱灵魂、侵蚀德性的温和而强大的专制（力量）”。而这样的过程并不能为众人所轻易识破，托克维尔对此有着翔实的描绘：“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这样的一种平等所导致的人类自由荡然无存的图景令人从心底感到可怕，这是灵魂的堕落和人性的丧失的结果，这些托克维尔对自由主义的悲观预测。

然而大政府也是有限度的，奥地利财政学家葛德雪在1917年的文章《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中首次提出了“税收国家”的概念。他认为：人民需要国家提供的服务需求会越来越大，税收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公共服务导向的“税收国家”。

1918年，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反驳葛德雪的观点。他在一篇名为《税收国家的危机》的文章中预见“税收国家”的危机，提出政府支出的增长必然超越国家税收的增长，平衡财政的治国理念必将面临挑战。10年之后，1929-1933年的“大萧条”爆发了，大萧条席卷全球并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此，赤字财政取代了平衡财政，负债国家取代了税收国家，政府支出的不平衡预算成为主流，熊彼特的危机预言一语成谶。现代政府必须通过债券和货币的发行来弥补预算赤字，由此开启了经营型政府的新时代。

总之，政府提供更多服务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大趋势，但政府扩张自身也是有局限的。

(作者 高连奎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主管)

五大国有银行日赚 23.6 亿 银行暴利稳步增长

特约撰稿 王传涛

近日，银行相继公布2013年业绩。其中，五大国有银行2013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8627.23亿元，相当于平均日赚236亿元。根据银监会此前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年，银行业实现了净利润1.38万亿元，由此计算，五大行净利润占整个银行业的62.5%。

国有银行日赚亿金，早已不是新闻。但是，每到银行业绩报告发布之时，公众仍然会投以莫大的热情进行关注。必须要说的是，公众关注的不是银行是不是赚钱，而是去年又赚了多少钱、每天能赚多少钱？如果数字比前年瘦身可能会有些许安慰，若是比前年更夸张，则汹涌的民意必然充斥于网帖之中。原因只有一个：银行赚的不是别人的钱，而是老百姓和企业的血汗钱。

透过数字看现实，伤痛是“有赠无减”。在五大国有银行中，最赚钱的工商银行又一次刷新了每天赚钱的纪录。2013年，工商银行日均利润高达7.2亿元。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笔者的解读是，代表了“银行暴利稳步增长”的趋势。你看，2012

年，工商银行日赚净利6.54亿元；2011年，工商银行日赚净利5.71亿元；2011年工商银行日赚净利4.55亿元。银行利润每年都有增长，金融改革就会容易让人失去信心。

银行业的暴利，还必须和实体经济进行比较。中石化、中石油都是“世界五百强”，可是在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确立之后，在利润方面，“两桶油”利润相加是日赚539亿，远远被工商银行甩在了后面。除此之外，更宏观的数字是：据统计，我国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总额平均只占500强总和的6%左右，但它们的利润总和却占500强总和的30%。

夸张的数字，不成比例的对比，已经让人麻木。问题只有一个，对于我国金融改革而言，银行暴利何以破题？笔者认为，银行暴利的核心问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无法取得重大进展，则银行暴利仍然会压缩民生、中小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生存空间。

一是整个牌照问题。当下，我国金融市场并未向民营资本放开。但是值得期待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这样的描

述，“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且，有消息称，已经有几家民营资本银行通过了金融主管部门的审核。这当然是值得期待的。但是，中国出现如“雷曼兄弟银行”这样的能够曾经具有过世界影响力的私人银行，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银行的利率问题。我国银行利率是央行决定的，现在我国的存贷款利率之差有3点多，而世界银行存贷款利率差只有1点多。这也正是我国银行最赚钱的原因所在。2013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开了贷款利率的下限管理，但实际情况却是，我国贷款利率仍然高企，似乎各家银行共同形成了“利率联盟”。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分别在不同场合表态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是，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具体是在什么时候仍然没有准确消息。再者，我国银行绝大部分都是国有银行，如何在利率市场化之后打破“利率联盟”，仍然是难题。

三是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问题。长期以来，民间融资属于非法的现实，众多中小企业必须转而求助于银行进行贷款。银行

放贷也便容易占据主动地位，提高利率甚至是银行内部人士放高利贷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值得庆幸的是，温州已经放开了民间融资垄断管理，这不仅容易让中小企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更会对银行业务构成一些冲击。问题是，只有更多的地方在严格管控的基础上放开对民间融资的垄断管理，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种种苛求、刁难和巨额暴利才会减少。

破题银行暴利，是一个系统而浩大的改革工程，异常复杂，且阻力重重。但是，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改革要啃硬骨头”，还是李克强总理所讲“改革攻坚必须壮士断腕”，都给了我们以强大的信心。我国贷款利率体系得到完善的结果早日到来。

各票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两百万起贷
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手续简单 利率低 放款快
咨询电话：028-68801888